

略论晚清时期浙江城市经济的演变*

□ 陈国灿

内容提要 晚清时期,浙江城市经济发生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开埠通商和口岸贸易的兴起,不仅使城市经济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和市场体系之中,而且对传统自然经济形成很大的冲击,引发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动;近代工业和金融业的产生和发展,则直接反映出城市经济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但这种近代转型远未完成,呈现出传统性、近代性和殖民性互相交织的特点。

关键词 晚清 浙江 城市 经济

作者陈国灿,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城市史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学院教授。(金华 321004)

中国城市的发展,到晚清时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伴随外来因素的楔入和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化,传统城市开始了曲折的近代化进程。浙江是近代对外开放和社会变革的前沿地区,其城市演

变既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又有着自身的特点。本文侧重从城市经济的角度,就此作一番考察和分析。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浙江省文化工程课题“浙江城镇史研究”的阶段成果。

in a Hyperbolic Economy[J].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9, 473-484

33 Reynolds D. B. 1999 Entropy and Diminishing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Resources Policy* 25, 51-58

34 Solow, R. M. 1974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Exhaustible Resource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1, Symposium on the Economics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 29-45

35 Solow, R. M. 1986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88, 1, 141-149

36 Stiglitz J. E. 1974a Growth with Exhaustible Natural Resources: Efficient and Optimal Growth Path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1, Symposium on the Economics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 123-137.

37 Stiglitz J. E. 1974b Growth with Exhaustible Natural Resources: The Competitive Economy[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1, Symposium on the Economics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 139-152

38 Tilton, J. E. 1996 Exhaustible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wo Different Paradigms[J]. *Resources Policy* 22, 91-97.

39 Withagen, C., Asheim, G. B. and Buchholz W. 2003 On the Sustainable Program in Solow's Model[J]. *Natural Resource Modeling* 16, 219-231.

40 Withagen, C. and Asheim, G. B. 1998 Characterizing Sustainability: The Converse of Hartwick's Rule[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3, 159-165.

责任编辑 董希望

一、口岸贸易的兴起及其影响

晚清时期浙江城市经济的变化,是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逐渐展开的。鸦片战争后,宁波率先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正式开埠。此后,根据中英《烟台条约》和中日《马关条约》,温州、杭州分别于光绪三年(1877)和二十二年(1896)相继开埠。

商埠的开辟,打破了清前期以来浙江的对外封闭状态,使近代对外贸易的兴起成为可能。然而,在开埠后一段时期内,传统自然经济所具有的自给性和低消费性极大限制了口岸贸易的规模。宁波口岸的贸易总值,开埠当年一度有西班牙元50万元,次年即大幅缩减为不到13万元,此后更降至5万元以下。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上半年,进出口货物只有17匹本色布、3担人参和300担檀香木。^①曾任英国驻华公使和商务监督的德庇时失望地说:“原先以为,由于贸易转向宁波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好处,但事实上转向宁波的贸易极小,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②咸丰二年(1852),英国人米琪尔(Mitchell)在报告中也感叹:“我们虽然在不同时期中曾以低于成本20%至30%的价格把布匹强销于中国,同时几乎是按照他们的要价买华茶以作交换,但是在推广英国货物在华销售方面,我们显然是失败了。”^③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进一步深入,其经济活动获得更多的特权,同时以机制工业品为主体的洋货,其生产具有规模大、成本低的特点,较之于国内手工业产品明显具有“质优价廉”的优势,由此逐渐打开了内地市场。各口岸的洋货进口净值,宁波在温州开埠前的光绪二年(1876)已有570多万海关两,到杭州开埠前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超过了800万海关两,光绪三十三年(1907)更是达到1200多万海关两;温州在开埠当年仅22万余海关两,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超过了100万海关两;杭州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不到200万两,至光绪三十年(1904)增至500多万海关两。与此同时,土货出口也呈快速增长之势。各口岸的出口总值,光绪二十四年为890多万海关两,光绪三十三年增至近2000万海关两,10年中增加了1倍多。到清末宣统元年(1909),全省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已接近4000万海关两。^④

从表面上看,口岸贸易的迅猛发展似乎是传统海外贸易的复兴,其实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传统海外贸易局限于若干国家和地区之间零散的商品交易活动,不仅规模有限,而且输出品主要集中于陶瓷、丝绸等少数手工业品,输入的多为高档奢侈品,故其总体影响十分有限。近代口岸贸易属于世界范围贸易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以规模化的形式输入各种工业品,输出工业原料与农副土特产品,由此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是广泛而深刻的。

近代口岸贸易的兴起和发展,使原本封闭的城市经济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和市场体系之中。这种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并不只限于口岸城市,而是由口岸城市逐渐扩展到内地城市,由大中城市逐渐扩展到小城市。事实上,无论是洋货的输入和销售,还是土货的收购和输出,主要是通过各级城市和市镇进行。以光绪二年(1876)宁波口岸输入的部分洋货在浙江各地的流通情况为例:棉制品经由绍兴、杭州、温州、衢州、金华、严州、处州销售的分别为7993件、2020件、84153件、130726件、9238件、15159件和67884件,合计317173件;毛制品经由温州、衢州、金华、严州、处州销售的分别为4467件、1598件、18件、135件和906件,合计7124件;铁经由绍兴、杭州、衢州、金华、严州销售的分别为10619担、638担、3310担、1537担和297担,合计16401担。^⑤进一步讲,近代口岸贸易也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一种形式,尽管列强强迫清政府开放口岸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使之成为工业产品的倾销地和原材料供应地,但客观上却推动城市经济逐渐由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变。浙江近代工业率先在宁波、杭州等城市出现,就是因为口岸处于对外开放的前沿,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最早和最明显。也正因为如此,晚清时期的浙江城市经济日益表现出半殖民地特征,其发展和兴衰明显受制于列强的经济渗透程度和市场控制力度。

近代口岸贸易的兴盛,对以小农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引发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化。一方面,大量工业品的涌入,导致个体手工业纷纷破产。当时有人指出:“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

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什、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⑧以棉纺织业为例,由于机器生产的洋纱和洋布价格低廉,在市场竞争中较本土棉纱和棉布具有明显的优势,其输入量不断增加。由宁波口岸输入的洋纱,光绪十二年(1886)尚只有区区30担,到光绪十八年(1892)骤增至16932担,6年中增长了563倍!^⑨光绪十四年(1888),宁波、温州口岸输入处州一地的洋布就超过了10万匹。^⑩到19世纪末,“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衣洋布者十之八、九”,^⑪于是,“民间纺织,渐至失业”。^⑫再以冶铁和铁器制造业为例,宁波的冶铁业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受到洋铁的排挤,铁针、铁钉等铁器制造业也开始走向衰落。到60年代末,其土铁几乎全被洋铁取代。^⑬温州的洋铁输入量,光绪十一年(1885)为700余担,第二年激增至3500余担,^⑭此后仍在增加,当地的土铁业由此很快走向破产。光绪十四年(1888)开始进口洋针后,土针制造业也遭受同样命运,最终销声匿迹了。不过,这种冲击对于城市经济来说又是一种契机,它从外部突破了小农经济极其牢固的自给性结构,有利于近代工业的引入和成长。另一方面,各种工业原料出口的迅猛增长,推动了相关领域商品生产的不断发展。如棉花的大量出口,刺激了商品化植棉业的空前兴盛,“浙江海滨沙地皆棉田也,每岁所收,为出口一大宗”。^⑮茶叶贸易的活跃,带动了茶的种植和加工业市场化程度的显著提高。光绪十二年,全国茶叶出口量为221.7万担,其中杭州所产的“杭茶”和绍兴所产的“平水珠茶”分别占了20%至25%左右。^⑯民国《杭州府志·物产》中说:“通商以来,每岁货茶出洋之值,以数十百万计,其利与蚕丝相埒,实出产之一大宗。”这就进一步推动自然经济走向解体,使农村由城市消费品的生产地转向城市原料的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二、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如果说商埠的开辟和口岸贸易的兴起更多地属于引发浙江城市经济变革的动力因素的话,那么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则是城市经济近代转型的直接反映。

中国近代工业是在列强的经济侵略和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从全国范围来看,近代工业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而出现的。洋务派打着“自强”和“求富”的旗号,创办了我国第一批近代军工企业和民用工业企业。浙江是洋务运动较为薄弱的地区,虽然部分地方官员也曾筹划开办一些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但大多没有正式建立起来。只有刘秉璋主持浙江政务时,在原作坊式官办制造局基础上创办的杭州制造局,算是较为成型的近代军工企业。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受到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和列强殖民侵略与经济掠夺不断加深的刺激,浙江各界实业救国的呼声渐趋高涨,部分开明官僚、士绅和商人开始重视民族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光绪十一年(1885)前后,宁波出现一家机器轧花厂,购置日本制造的40台铁制轧花机进行棉花加工。这是浙江私人资本创办近代工业的开始。此后,又有严信厚等人募集白银5万两,于光绪十三年(1887)在宁波创办通久源机器轧花厂,购置新式轧机40台,雇佣工人数百名;光绪十年(1889),部分宁波商人集资在慈溪开办火柴厂,聘请日本技师指导生产,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火柴厂之一;光绪十八年(1892),有商人出资2万元在杭州开办机器印刷厂,购置蒸汽印刷机2台,雇佣工人约30人;次年,茶商陆佑臣在温州开办裕成茶栈,使用新式机器制茶,销往国外。可以说,中法战争后至中日甲午战争前是浙江近代工业的发轫期,尽管创办的企业只有寥寥数家,规模也有限,却标志着近代工业在浙江的起步。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迫于形势,逐渐放松对民族资本主义的限制,“谕令各省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浙江各地城市的近代工业企业明显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1895~1900)的5年中,全省先后出现的近代工业企业有20多家,分布于宁波、杭州、温州,以及嘉兴、绍兴、慈溪、萧山、嘉善、平湖、桐乡、海盐、余杭、富阳、瑞安等沿海地区城市。^⑰其中以棉纺织业和缫丝业居多,最著名的是所谓的“三通”和“三丝”。“三通”是当时棉纺织领域的3家大型企业,即宁波的通久源纱厂、杭州的通益公纱厂和萧山的通惠公纱厂。通久源纱厂创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开办资本45万元,

有纱锭 11408枚,雇佣工人 1800名。通益公纱厂创办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办资本 53.3万元,有纱锭 15000枚,雇佣工人 1200名,并在绍兴和杭州塘栖镇设有分厂。通惠公纱厂创办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开办资本 56万元,有纱锭万余枚,雇佣工人 1100名。“三丝”是缫丝领域的 3家较具规模的企业,即绍兴的开源永缫丝厂、杭州的世经缫丝厂和萧山的合义和缫丝厂。开源永缫丝厂设于邻近曹娥镇的白米堰,是当时市镇近代工业的代表。世经缫丝厂设于杭州拱宸桥,“用日本煤,一日二吨有余。机器用上海磨宜笃公司所制造,与怡和洋行制丝所用相同,皆新式”。^⑥该厂雇佣的女工多是从上海招募来的,技术比较熟练。其原料以本地所产优质蚕茧为主,产品以“西冷”为品牌,销往上海,一度以质优闻名。合义和缫丝厂设于萧山东门外,开业后营业较为顺畅,所产“和合”牌生丝,在上海等市场获得好评。光绪二十五年(1899),丝厂增置车锭,扩招女工,规模进

一步扩大。^⑦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在内外危机的压力下,宣布实行“新政”,采取鼓励实业的政策,进一步放松了对兴办近代工业的控制;同时,全国范围不断掀起的“抵制外商,争回权利”的运动,也刺激民族资本更加广泛地参与兴办工业的活动。于是,浙江城市的近代工业呈现出较快的发展,企业数量增多,规模扩大,涉及行业领域增加。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在清末的 10余年时间里,浙江各地新办的近代工业企业有 90多家,分布于 25个城市,包括了所有府级城市和众多县级城市(见下表)。在地域上,由原来局限于杭州、宁波、温州等通商口岸和东部沿海城市,扩大到金华、衢州、丽水、湖州、兰溪、义乌、诸暨、孝丰等一批内地城市。从生产行业来看,涉及棉纺织、丝业和丝织、粮油食品加工、日用品、造纸、机器、印刷、卫生用品、建材、照明等多个领域,明显较 19世纪末要广泛得多。

清末浙江各地城市新办近代工业数量^⑧(单位:家)

城市	企业数量								
杭州	28	湖州	2	温岭	1	定海	1	上虞	1
宁波	21	金华	2	瑞安	1	兰溪	2	萧山	1
温州	7	衢州	1	德清	1	义乌	1	平湖	1
绍兴	7	丽水	1	孝丰	1	镇海	1	海宁	1
嘉兴	3	黄岩	1	余姚	1	诸暨	2	西安	1

进一步看,清末浙江城市近代工业的发展具体又可分为三个时段:一是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901~1903),为缓慢发展期。在经历义和团运动和庚子事变冲击所导致的短暂低潮之后,浙江城市近代工业逐渐恢复。杭州、宁波、温州等城市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业企业,但总体数量不多,且多为小资本企业。二是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三年(1904~1907),为高涨期。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和列强之间的矛盾加剧,对中国民族工业的挤压有所放松;同时浙江各地掀起抵制洋货、收回路权的斗争,从而引发了一轮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尤其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杭州、宁波、嘉兴、绍兴、湖州、金华、温州、德清、孝丰、西安、定海、兰溪等城市新办的企业有 20多家,涉及棉纺

织、丝织、食品加工、制烟、日用品、化工、造纸等多个行业。其中,宁波的通利源榨油厂是浙江近代第一家机器榨油厂,有新式榨油机 4台,雇佣工人百余名,利用纱厂轧花剩下的棉籽作原料,每天可榨棉籽 10万斤。由戴瑞卿、顾元琛创办的和丰纱厂,资本高达近 84万元,有纱锭 11万枚,雇佣工人 1800多人,每月产纱 1000包,其规模不仅在当时浙江全省首屈一指,从全国范围来说也是属于大型棉纺厂之列。三是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三年(1908~1911),为相对低落期。由于政局动荡,金融恐慌频发,加上外国资本的竞争,浙江各地不仅设厂的数量明显减少,而且经营状态也不甚理想。如宁波和丰纱厂因棉花价格上涨,利润大幅下降;通久源纱厂“只能勉强开销,未能获利”。

到宣统三年, 两家纱厂均因“生意不佳, 棉花价昂”, 只得“暂行停机”。^⑩宁波通利源榨油厂也因原料来源发生困难, 不得不宣告关闭。1909年的《海关册》在谈到宁波工业企业的情况时说: “洋皂厂、洋烛厂、自来水厂, 传云皆属亏本”。

三、城市金融业的变化

在近代工业兴起和发展同时, 城市金融业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其主要表现是传统钱庄的转变和近代金融业的出现。

自明代以来, 浙江各地的钱庄业一直比较活跃。到晚清时期, 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钱庄业更为活跃。据有关学者的统计, 到1912年, 全省的钱庄有245家之多。^⑪不过, 相对于数量上的增加, 更值得注意的是钱庄体制和运作方式的变化。一方面, 钱庄逐渐与近代工商业建立起密切的联系。除了为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和对外贸易活动提供资金调剂和融通, 近代工业企业所需的资金, 也有相当部分由钱庄来承担。一些钱庄经营还直接参与近代工业活动, 使金融资本进一步向工业领域渗透。如先后创办通久源轧花厂、通久源纱厂等近代工业企业的著名实业家严信厚, 原本从事钱庄业, 开设有“源丰润”票号, 经营汇总和存放款业务; 号称“五金大王”的叶澄衷, 在宁波等地开设钱庄的同时, 又经营商业、地产和工业企业; 镇海柏墅方氏家族最初以经商起家, 后以经营钱庄业而积累起雄厚资本, 至第五代方液仙进而投资实业。另一方面, 在经营方式上, 从19世纪四五十年代起, 宁波等地的部分钱庄率先采用“过帐”制度, 即在日常商业交易活动中的款项支付, 不用现钱或票据进行结算, 而是凭簿折划转。“凭计簿日书所出入之数, 夜持簿向钱肆汇录之, 次日, 谓之过帐。”^⑫这种“过帐”制度, 已具有近代金融业票据交换制度的特点, 表明传统钱庄正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 以适应城市经济的新环境和新需要。

当然, 钱庄毕竟属于传统的金融业形式, 完整意义上的近代金融业在浙江的出现是在20世纪初。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起, 浙江各界掀起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 要求收回沪杭甬铁路的筑路权。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 来自浙江各地的绅商联合发起成立浙江铁路公司, 集股修筑铁

路。到次年, 已募集股金白银400余万两。最初, 公司将款项存于杭州和上海两地的各家钱庄, 使用很不方便。为加强资金管理和营运, 便于进一步融资, 光绪三十三年(1907), 经浙路公司股东大会讨论, 决定成立“浙江兴业银行”, 资本额为100万元, 分为1万股, 其中公司承购3841股, 其余股份面向社会招募。银行总部设在杭州, 又陆续在本省部分城市和上海、汉口等地设立分行。这是浙江第一家近代商业银行, 成立后, 很快就获得社会的信任, 年吸收存款由最初的200万左右增至300万元。除了经营存放款业务, 兴业银行还获得了发行银行兑换券的权利。据统计, 从光绪三十三年到宣统三年(1907~19011), 共发行银行兑换券189万余元。^⑬

继兴业银行之后, 又有大通商业银行和浙江银行。前者是浙江第一家近代储蓄银行, 由湖州绅商杨鼎恩等发起成立。光绪三十四年(1908), 杨鼎恩等人具禀清政府农工商部请求筹办商业银行, 获得批准。于是, 向社会募股本银洋30万元, 在是年8月正式营业。但该行成立仅一年, 即因故宣告停业。后者系浙江第一家官商合办银行, 由浙江巡抚增韫发起成立。光绪三十四年(1908), 增韫奏请朝廷, 要求将官钱局改制为银行, 但未获批准。次年他再次奏请, 终获朝廷同意, 遂招募商股, 采用官商合办的方式。银行成立时, 实收股金银54.2万两, 其中官股30万两, 商股24.2万两。总行设于杭州, 又先后在上海、广州等地设立分行。其经营业务除存放款外, 还拥有经理省财库和发行银行兑换券的特权。不过, 浙江银行成立, 由于管理体制落后, 经营不善, 连年亏蚀。

除了上述浙江本地发起成立的银行外, 一些省外银行也先后来浙江设立分支机构。如光绪三十四年, 宁波籍商人李厚祐等在上海创办四明银行, 随即于当年在宁波设立分行, 次年又在温州开设分行。由清政府开办的大清银行, 也从宣统二年(1909)起陆续在杭州、温州、宁波设立分行。

在兴办银行的同时, 浙江各地还陆续出现了一些具有近代金融企业特点的保险公司。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 寓居上海的浙籍绅商募集股银100万两, 在杭州、嘉兴、湖州等地设立“华洋人寿保险公司”, 经营人寿保险业务。同年, 衢州绅商

集资成立“衢州水险公司”。当时《东方杂志》刊文介绍说：“衢州各商以水程装运货物，每致损失，且蹈危险，特集资万元。创设公司，依照西洋法保险。经县通详立案，名曰衢州水险公司。”宣统元年（1909），台州也成立一家“允康人寿保险公司”，资本50万元。开办后，业务颇为顺畅，年保险费收入有2000余万元。^③

四、余论

晚清时期浙江城市经济的演变，就其发展方向而言是传统工商业经济向近代工业经济的转变。这种转变，在过程上经历了19世纪中期的最初发萌，19世纪后期的逐渐展开和20世纪初的进一步深化三个阶段；在空间上表现为由口岸城市到沿海城市，由沿海城市到内地城市的逐步扩展。从产业变动方面来看，是从商贸领域开始，扩展至商品生产领域，再到相关服务领域。这与西方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首先是从生产领域开始的，近代工业的迅猛发展，不仅确立起城市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使农村沦为城市工业生产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地，而且引发全球范围的经济扩张，包括商品扩张、市场扩张、资本扩张和生产扩张。

晚清时期浙江城市经济的转变是外力冲击下的被动过程，是列强殖民势力入侵的产物，有着先天的不足和诸多的局限。姑且不说口岸贸易的兴盛意味着浙江各地城市成为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地和掠夺各地区原料的据点，即就近代工业而言，也一直处于内外压力的隙缝中，远未达到成为城市经济主体和核心产业的地步。更何况，在地域格局和城市个体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这也正是此期中国城市近代转型的突出特点。从历史的角度讲，整个晚清时期只是浙江城市经济近代转型的开始阶段，呈现出传统性、近代性和殖民性交织在一起的特点。

注释：

- ①姚贤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58页。
- ②[英]德庇时：《战时与缔和后的中国》，《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9页。
- ③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三

联书店1957年版，第501页。

④以上所引各口岸进出口贸易数据，参见《浙海关贸易册》、《甌海关贸易册》、《杭州海关贸易册》，载杭州海关编译：《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甌海关、杭州海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⑤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6册，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41页。

⑥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65页。

⑦姚贤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426页。

⑧《浙海关贸易册（1888）》。

⑨郑观应：《盛世危言》第7卷。

⑩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32页。

⑪《宁波资本主义工商业简史》，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

⑫姚贤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439页。

⑬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1页。

⑭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浙江省卷第四编，1933年版，第230页。

⑮有关19世纪后期浙江各地开办的近代工业企业数量，学术界的说法不一，这里主要依据孙毓棠、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沈雨梧《浙江近代经济史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赵世培、郑云山《浙江通史（清代卷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部分新编地方志的有关内容统计，其中不涉及轮船航运等其他近代企业和在农村市镇开设的工业企业。下同。

⑯《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月二十一日。

⑰《中外日报》，1899年2月18日。

⑱表中所列仅限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宣统三年（1911）期间各城市新出现的近代工业企业数量，不包括此前已开办的企业。

⑲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32、844、882页。

⑳李国邦：《闽浙台地区清季民初经济近代化初探》，《中国史学论文选集》，（台）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㉑光绪《鄞县志》卷2《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㉒吴箬中：《浙江最早的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载《浙江金融》，1985年第2期。

㉓民国农商部：《第一次农商统计表》，民国元年。

责任编辑 王三炼